

■学人素描

“外资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论调的主要反对者

王志乐：以开放心态审视在华跨国公司

◎张量

“如果说，过去跨国公司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那么，今后跨国公司也可以为我国和平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及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发挥积极作用。”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是近年来学界“外资威胁国家经济安全”论调的主要反对者，他以扎实的研究和强有力的论述为中国利用外资第二阶段战略提供理论支持。在他看来，站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最前沿的中国，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让跨国公司成为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积极力量。



引导跨国企业 助力中国转型

去年，当内地一些学者质疑外资并购，一些媒体也相当强烈地发出外资威胁国家经济安全的呼声时，对此，王志乐在给政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以及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明确反对限制外资并购。他解释说，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空前增强，目前是有史以来，起码是1840年以来国家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中国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中是步步紧跟节点，走在最前沿的国家，中国越开放越安全。至于开放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应当在扩大开放中去纠正、完善。

在王志乐看来，外资并购问题不值得渲染到国家经济安全高度。中国的企业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三大方面军，应该把外资企业看作是中国企业的一部分，把“外资企业”等同于“外国企业”是不对的。

他认为，在全球化条件下，在市场经济中，股权是流动的，资本是流动的，所有权也是流动的。你今天可以收购我，我明天也可以收购你。不要以为目前被人收购了是多么严重的事。如果了解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站到全球高度，从市场竞争的角度以及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我们就会对外资并购有新的理解。我们要学会在企业所有权相互渗透的条件下看待和参与全球竞争，不能用过去的观点和方法分析现在新的企业竞争形势。

王志乐不仅希望国人消除对外资企业的误解，更致力于引导外资企业融入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重要力量。

他认为，当今市场竞争规则已经改变，战争与暴力的掠夺以及不公平交易的攫取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和平、公平的市场交换。通过市场竞争的渠道吸纳和整合国际资源要求中国扩大对外开放，融入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潮流，获得和平崛起所需要的资源，这就需要跨国公司。

王志乐说，中国选择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意味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吸收和利用外资的思路也应当随之转变：从利用外资促进中国企业国内发展到促进中国企业全球发展；从利用外资促进中国企业引进技术到促进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从利用外资促进中国经济规模增长到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因此，他坚持认为，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如何收缩外资规模，如何限制跨国公司的作用，而是如何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的

积极作用，使跨国公司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

在研究的同时，王志乐积极从事能够推动跨国企业融入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活动，成功举办了跨国公司与中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最近还组织产、学、官、媒四位一体的考察团，深入考察日本跨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节能、降耗、减排”中的新成果，总结经验，为中国企业提供范例。

王志乐说，企业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体，必须先让他们有转型意识，才有可能带动中国转变。用外资来做中国企业的借鉴，同时也规范了跨国企业，让他们更好地为我们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结合国情创新 常抱大国心态

对于近年来一些学者套用西方

理论评判中国改革开放实际的现象，王志乐颇感担忧。他认为，我们应当学习、借鉴国外学者对于外贸等对外经济研究的成果，但是必须认识到，中国处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最前沿。过去的一些理论以及外国的做法，不完全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恰恰需要中国人在吸收和借鉴国外研究的基础上“自主创新”。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结果只能流于荒谬。

王志乐常说，中国是大国，中国人应该有大国心态，能够包容、谦虚，因为中国有远大的未来。

他说，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种特别的竞争力——反征服征服者的能力，历史上多少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最后都融入到中华文化当中了。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们应当以这种反征服征服者的信心和有能力参与全球竞

■本期人物话语



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提升资本市场投资价值

尚福林(证监会主席)6月21日在上海的首届“上市公司高峰论坛”表示，今后一段时期，证监会将着重做好以下五项工作：一是积极推进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努力拓展市场的广度与深度；二是鼓励和吸引优质大型企业和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发行上市，优化上市公司结构；三是健全和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四是不断改进和加强上市公司监管，切实提高监管有效性；五是推进行业自律组织建设，逐步形成行政监管、法制监管、自律监管和社会监管互为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管体系。

■多声道

警惕外资狂买国内资产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6月21日在北京举行的东亚金融峰会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上表示，过于僵化和缺乏灵活性的汇率制度，容易受到国际游资的冲击。而短期投机性资本的异常流动可能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外资大量流入造成的国内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对外资过度追逐国内资本“必须”保持警惕；应加强研究对冲基金和跨国投资活动的监管方法。同时，各国应实行适合本国国情的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当前的升值压力来自中国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这是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汇率不能解决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人民币升值的速度不能太快是汇率改革的基本方针。

过剩流动性应转向农村

唐双宁(银监会副主席)日前在第三期农村信用社省联社理(董)事长和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上表示，解决当前流动性过剩的问题，需要依靠市场手段，发挥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其他政策等合力，将东部、城市过剩流动性引向西部、农村和小企业，降低外汇储备，扩大国内消费，最后收到综合解决的效果。围绕系统解决银行“流动性过剩”和金融资源配置失调问题，一是建立以金融为主体的投向机制。二是建立财政对银行发放的农业贷款给予贴息的导向机制。三是中央和地方出资成立各类担保公司，为银行向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提供担保。四是引入各类资本设立新的农村金融机构或网点，引入良性竞争与合作机制，激活整个农村金融体系。

解决民企市场准入需内外兼修

辜胜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经济学家)日前在京举行的“2007年中国市场准入与企业高层论坛”做主题演讲中指出，在“非公经济36条”出台后的重要经济转型期，民营企业要真正实现市场准入平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就民企自身素质而言，企业在人才管理、企业治理结构、企业战略管理等方面依然内功不济，是否完全有能力进入一些重要垄断行业并站稳脚跟存在障碍；就外部市场环境而言，许多领域对民企依然设置有过高的准入门槛，融资困难、政商关系扭曲等问题依然牵绊着企业拓展市场的脚步。企业内强自身素质，政府外优市场环境的内外“兼修”之道才是民营企业实现有条件进入市场、有能力占领市场、有实力开拓市场的必由之路。

减少退税对出口总体影响不大

周世俭(中国国际贸易学会常务理事)在近日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信息联播栏目记者采访时说，大范围调整出口退税商品的新政策对部分出口企业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对我国出口的总形势影响不大。同时，从公布的商品结构来看，除高能耗高污染商品外，低科技含量产品也成为了不鼓励出口的主要商品。

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营机制转换的关键时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是如何收缩外资规模，而是如何进一步发挥跨国公司的积极作用，使跨国公司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中国在第三次经济全球化中是步步紧跟节点，走在最前沿的国家，中国越开放越安全。至于开放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应当在扩大开放中去纠正、完善。

这样扎实的、走访一家企业的深入调研，王志乐建立起了他的学术网络。在研究外国跨国公司基础上，他又进入了中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如今，他与全球500大公司中许多著名大企业以及中国大企业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无疑是在跨国企业研究中最大的优势，因为可以持续获得中外跨国公司的诸多最新发展资料。

如今，王志乐致力于研究经济全球化、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竞争、跨国公司的战略管理以及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和跨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经验，并从2001年起，每年撰写《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报告》，其主要研究著作已经有20余本。

韧性学者 钻研外企

王志乐从1992年开始在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工作至今，在中国研究跨国公司整整15年。同时，他还兼任着国家产业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集团公司促进会副会长，中国投资协会外资投资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特约研究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高级顾问，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北京新世纪跨国公司研究所所长等众多职务，并且获国务院颁发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证书，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这位成就卓著的经济学者其实是研究历史出身。“文革”前，王志乐在北京四中初中和北京师大二附中高中“文科试验班”学习，在那里打下了扎实的文科功底。1968年，王志乐跟随上山下乡的知青潮来到了北大荒国营农场，度过了最底层劳动者的10年。1978年，王志乐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第二年他跳级成为本校研究生。1982年，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的王志乐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期间于1985年到1988年在德国和瑞士学习德国和瑞士经济史、企业史和现代化史。

正是在国外的这段留学经历促使他的研究转了向。王志乐基于对国家的强烈使命感，开始研究德国19世纪的崛起，他掌握的材料越多，越是觉得经济史是关键，而企业史又是德国近现代经济史的关键。于是，他一步步从研究现代大企业历史开始进入了对跨国企业的追踪研究。

1992年，王志乐离开人民大学，来到了更对“口味”的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开始了他对德国在华企业的调研。由于当时条件有限，王志乐到上海考察外企时，只能借兵团战友的自行车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调研。一位外企老总送他出门时，看到他的“坐驾”非常感慨。正是凭着

■美加观潮

终年乱穿衣 后生玩 CODE

◎徐程

我有件“金羊牌”皮夹克，还是20多年前买的。那时候在上海，有股穿皮夹克的潮流，几家著名的皮草行隆冬季节挤破了门。谁知现在衣服还很好，式样早已淘汰。在中国的大城市，已经没有人再穿“皮壳子”了。前几年我把那件皮夹克带到了加拿大，并穿到了教堂。不料牧师看到后眼睛一亮，连说：“Nice jacket!”看来是真的在赞美。

留意一下加拿大人的穿着，你会发现有一种各自为政、各施高招的现象。绝对看不到流行的一律。比如这几年在国内看到许多男士爱传单领的夹克，民工穿白领穿甚至相当级别的干部也穿。这种打扮确实是人多一份帅气，但也多一份邪气，贴身保镖黑道人物最适合穿这种夹克。当然“扮酷”就是另说。

由于加拿大大部分地区较寒冷，所以人们出外总是一件羽绒服，再好的身材也变得臃肿不堪。逢到下雪，正合了首打油的诗：黄狗变白，白狗变肿。哈哈，不可引类。但加拿大人穿着的确不讲究。没有人注意你穿什么。于是穿得再好也是锦衣夜行。

我有位法国做服装的朋友，前年来考察加拿大的市场，说没戏。法国的时装美服在此歇菜。

在加拿大你有穿着自由，没有攀比的压力。这种身心的解放，在今天的上海还享受不到。有次到银行开讲座，穿的随便了一点，备受听众的睥睨，他们竟不相信

我就是那个颇有名气的家伙。

其实，加拿大人的穿着并不是一乱到底的。在鸡尾酒会上人们极尽时髦之能事，在婚礼葬礼上也中规中矩。这且不算，主要是在青年人中，有一种所谓的“CODE”。这个词的意思是密码、代码。但在穿着上不知怎么翻译。我是听一位年轻人说的，以后我就关注起街上年轻人的CODE了。我发现同样是华人青年，移民以及留学生和CBC(加拿大出生的中国人)是大不一样的。移民的孩子一般从中国带衣服过来，或者在唐人街买衣服。衣饰偏于繁复、纤细。而CBC的穿着比较粗犷、简洁。在颜色上这几年偏向于黑灰色。新衣服穿在身上像旧的一样。尤其是皮鞋，更能一目了然。北美青年的鞋子都显得粗笨、霸气，而非北美的鞋子都比较精致，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的鞋子都如此。由此我发现，北美青年更以“BIG”为豪，经常进健身房，把胳膊练得跟脖子一样粗。而留学生和移民的孩子还是那么像豆芽菜。CBC的女孩也一样，走路时包斜挎着，两手摆动，步幅很大，全无半点袅袅婷婷的婀娜姿势。于是我想起许多好莱坞电影里的女孩，他们如遇强暴往往能拼死一搏，竟或脱险甚至克敌制胜。这在我们女孩子中往往是不可思议的。话说远了。

其实加拿大的乱穿衣还是有分寸的。一是区分场合，二是有特定的CODE，只是我们看不懂或者没学会而已。在每个大城市里总有些专门卖带有这种CODE的服装店。当然价格不菲，且年年不同。

■经济学术思潮追踪

教育经济学 在西方世界的变迁

◎梁怡

教育自产生以来，就和社会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较早的时候，学者就意识到了教育和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和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等都曾对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作过论述。例如，斯密说，“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兼取利润”。

但教育经济学在西方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则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当时的大背景是，二战后美国经济持续繁荣但技能劳动力呈现出不足倾向，欧洲、日本等国的经济发展也进入了真正的腾飞期，而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也逐渐成为世界性的课题。于是，教育对改革生产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所起的作用促使经济学家对教育经济效益问题越来越重视，经济学家开始注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教育。

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经济学

人力资本理论(Human Capital Theory)在20世纪60年代的产生标志着教育经济学的创立。现在人们意识到，尽管人力资本理论在对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解释存在缺陷，也未能有效解决教育外部性和教育投入的收益率问题，但人力资本理论作为教育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的地位却毋庸置疑。

40年前，世界上被广泛介绍的有关人力资本的理论是舒尔茨和加利·贝克尔等学者提出的。舒尔茨的核心论点是，单纯物质资本积累不足以说明美国的经济增长，还应该充分认识到以教育为中心的人的能力的改善所起的作用。这实际上说，一直被作为文化现象的教育能够以经济学范畴的“投资”来衡量和把握。而贝克尔的理论则给舒尔茨等经由观察得来的宏观假设赋予了微观理论基础。贝克尔认为，个人通过教育等提高能力和人力资本积累，由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收入。他还认为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所需要的直接或间接费用与此后的收入增加部分的关系，通过引入“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而定义之。

这样，人力资本理论从概念逐渐升华为经济理论，而以其为核心的教育经济学也具备了理论体系。

经济增长理论与教育经济学

经济增长研究的进展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动力的分析又为人力资本的发展拓展了巨大空间。

如前所述，人力资本理论从一创立就论述了教育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关联性，而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E·Denison等在研究与分析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经济资源时，也揭示了知识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早期人力资本学者的论著常引用E·Denison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为参考文献，教育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两者的发展实际上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

从实践看，上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也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缓慢发展或停滞阶段，劳动力需求不足、教育过剩和教育过度现象严重，引起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批判，锋芒直指人力资本理论在分配方面的应用，从而使之面临巨大挑战。

挑战之一来自“筛选理论”(Screening Theory)。这一理论认为，雇主以高工资雇用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是取决于其通过教育而获得的能力，因为学历仅是本人原有能力的反映。而教育的主要作用就区分(Screening)。筛选理论对所谓的教育“通货膨胀现象”作了充分解释。挑战二来自激进经济学家。桑塔非学派经济学家H.Gintis的理论便是这一批判的代表。他得出了以IQ所显示的认知能力为媒介不能说明个人的教育和收入的关系这样的实证结果。

从“人力资本”到“社会资本”

上世纪70年代的挑战和挫折使得人力资本理论学者们开始反思并弥补理论缺陷。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学者科尔曼、普特南等先后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并将其作为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的理论发展加以阐述，深化了早期人力资本理论学者们对人力资本理论中人与经济关系的论述。

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方法对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方法的弥补，提升了人的社会地位，从单纯的经济资源要素提高到资源运用的主体，并从微观层面为主的分析扩展到宏观层面，从群体人力资本的角度研究社会经济的增长，而且直接把无形资本因素(社会心理关系)引入了分析中。这不仅使对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于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性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

随着人类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教育的经济功能越来越强化。现代和未来经济的发展从本质上说主要依赖知识的生产力。当前，教育经济学研究开始在更广阔的范围取得进展；如何估算教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如何估算个人的教育投资和收益以及收益率；教育同收入分配和再分配之间存在着的关系；教育同劳动力市场变动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预测未来的劳动力供求；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教育经费，以便尽可能提高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等等。新时期的教育经济学已具备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现实和经济意义。